

进口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研究进展^{*}

魏浩 李晓庆

内容提要:传统的国际贸易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进口贸易对进口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随着微观企业数据以及微观个体劳动者数据不断出现,关于进口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更加细化。进口贸易对当地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动态变化过程表现为:进口贸易会对进口国国内企业造成冲击,带来短期失业,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将面临跨行业或跨地区流动,但是对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性别劳动者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进口冲击导致的劳动力市场调整会影响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决策。结合中国的现实,测度进口贸易导致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测度劳动力流动成本、利用企业层面的雇员数据测度进口贸易对企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进口贸易 劳动力市场 就业工资 劳动力流动

有关贸易开放对国内产品市场影响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而对要素市场影响的研究则侧重于考察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尤其是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再配置。随着微观企业数据和微观个体劳动者数据的大量出现,进口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日益微观化。近年来,大量文献开始从新新贸易理论出发,研究进口贸易对进口国不同企业、不同劳动者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将在系统梳理最新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探究进口贸易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首先,分析进口贸易对企业的冲击;其次,分析进口贸易对进口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再次,分析受进口贸易冲击后的劳动力市场再均衡;最后,分析进口贸易对劳动者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

一、进口冲击下的企业生存状况

(一) 横向进口竞争下的企业生存状况

从横向竞争看,进口会加剧该国同一行业的竞争程度,使竞争力较弱的企业销售遇冷,销售收入和利润下降,被迫退出市场,但是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会得以存活。一些劳动者在进口竞争冲击下虽然能保

住工作,但就业质量将有所恶化,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劳动者则不得不重新找工作,从而导致一部分劳动力跨行业或跨地区流动。从现实来看,劳动力流动受到多种因素阻碍,失业问题不可避免。

进口竞争冲击下,不同企业在就业和工资方面的反应存在差异。Itskhoki & Helpman(2015)通过理论分析发现,贸易冲击会使得劳动力在同行业中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再配置。他们将企业分为三类:继续存活的高生产率企业、继续存活的低生产率企业和退出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第一类企业在贸易冲击下就业规模会增加,第二类企业的就业规模会缩小但仍留在行业内,第三类企业则会退出市场。在此背景下,相对于仍留在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继续存活的高生产率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和工作保障均较高。Groizard et al(2015)利用加利福尼亚州1992—2004年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投入品和最终产品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进口冲击与行业中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以及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均密切相关,且投入品关税下降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幅度显著大于最终产品关税下降带来的影响。

^{*} 魏浩、李晓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件:weihao9989@163.com。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0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3020);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4YJA790058)。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此外,进口贸易带来的竞争不仅发生在进口国本土市场,还发生在进口国出口的第三方市场上。比如,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墨西哥,一方面,在墨西哥市场上与墨西哥企业的产品存在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在美国市场(墨西哥9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上与墨西哥企业的产品也存在竞争关系。Autor et al(2013a)首次研究了在第三方市场上的进口竞争效应,发现在美国出口的第三方市场上,来自中国的制成品进口同样构成竞争威胁,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但影响幅度小于美国本土市场。Mendez(2015)主要研究来自中国的制成品进口对墨西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且由于墨西哥对美国出口市场高度依赖,所以还考察了墨西哥在美国市场受到的中国进口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于中国进口竞争的加剧导致墨西哥当地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尤其是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影响更大。Donoso et al(2015)以西班牙为例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中国企业不仅在西班牙本土市场,还在西班牙出口的第三方市场与西班牙企业形成竞争关系。

(二)纵向进口互补下的企业生存状况

从纵向互补来看,进口投入品对该国进口企业有益。新的、高质量的、具有技术含量的进口投入品会增强进口企业的新产品优势、质量优势或高生产率优势,使其销售收益和利润增加,生产扩大,进而增加雇佣人数,尤其增加高技能工人人数。

随着中间品贸易稳步增长,进口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Crino(2012)利用27个转型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进口投入品会促进企业增加对技能工人的需求,其影响机制是投入品进口会给企业带来新产品产出、产品质量提升或新技术采用,而这些活动都增加了对技能员工的需求。Jiang(2015)采用39个国家的样本,将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分成5个部分(出口对本国就业、进口对本国就业、出口中的进口成分对本国就业、进口中的出口成分对本国就业、第三方市场上的进口竞争对本国就业),研究发现,2009年中间产品贸易创造了8800万个工作岗位,占国际贸易创造就业的14%。Federico(2010)采用1995—2007年意大利320个制造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会通过内部产业关联影响就业,将导致下游行业就业减少,上游行业就业增加。

二、进口冲击下的劳动力流动及其阻碍因素

在进口贸易影响下,如果进口竞争行业(与进口产品存在竞争的行业)就业规模萎缩,说明存活企业没有完全吸收死亡企业所释放的全部劳动力资源。那么,多余的劳动力就会流向有劳动力需求的其他部门或受到进口冲击较小的其他地区。从中期来看,劳动力会发生跨行业(部门)或跨地区的流动,即“换工作”或“搬家”。从理论上来看,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实际上,劳动力流动是不完全的,往往受到多种因素阻碍。

(一)进口冲击下的劳动力流动

1. 劳动力跨行业(部门)流动。劳动力跨行业(部门)流动包括两种情况:(1)在进口竞争的冲击下,劳动力会从竞争冲击较大的行业转向进口冲击较小的行业、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Autor et al(2013a)指出,面临中国产品的进口竞争,美国制造业中部分劳动力选择了换工作甚至换行业。Donoso et al(2015)研究发现,西班牙在面临国外进口竞争时,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了建筑业。Goldberg & Pavcnik(2007)也指出,进口贸易带来的竞争使得企业产品面临不确定性,进而企业更愿意雇佣非正规部门(是指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给予员工较差工作环境、不签订劳动合同等不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部门)的人员。Paz(2014)研究发现,巴西在1989—2001年进口关税下降期间,制造业非正规就业的占比快速上升,正规部门就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不断下降。Cosar et al(2016)也发现,进口自由化对工作流动和非正规就业增长存在促进作用。(2)进口互补机制导致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Fugazza & Fiess(2010)研究发现,进口投入品提升了非正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降低了非正规就业水平。McCaig & Pavcnik(2015)以越南1999—2009年的劳动力市场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后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具体来看:第一,年轻工人,尤其是移民,更可能在正规部门工作并且始终留在正规部门中;第二,在不同劳动群组中,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都是下降;第三,在非正规部门中,相对其他类型工人而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男性城镇工人更可能流向正规部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年长的、女性和农村劳动力很难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第四,劳动

力就业正规化与职业升级同时发生。

2. 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除了跨行业(部门)的流动外,贸易开放还会带来跨地区的流动。Autor et al(2013a)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研究发现,劳动力会从受到进口供给冲击较大的地区流向受到进口冲击较小的地区,或从出口需求较小的地区转移到出口需求较大的地区。Mendez(2015)对墨西哥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也发现,劳动力会从进口冲击较大的地区流向进口冲击较小的地区。

此外,全球化可能会提升劳动力市场上雇员与雇主的匹配效率,而这一效应一直被忽视。Davidson et al(2014)利用瑞士的雇员与雇主匹配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改善了具有较大比较优势行业中雇主与雇员的匹配效果。

(二)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

在进口贸易的影响下,劳动力将面临跨行业或跨地区的流动。实际上,劳动力跨部门、跨行业的流动是不完全的。进口国产业结构特征、劳动力流动成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劳动力特殊技能可能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自由流动障碍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对进口冲击的调整速度,进而影响进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

1. 进口国产业结构特征。劳动力行业间流动会受到国内产业结构特征的影响。Donoso et al(2015)研究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造成了西班牙制造业就业减少,但受到进口冲击的劳动力最终顺利流向了正在快速发展的建筑行业,整体而言,劳动力的行业间流动削弱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对西班牙就业的影响,没有造成西班牙的失业问题。而美国的产业结构与西班牙不同,针对美国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Bernard et al(2006)、Auer & Fischer(2010)、Autor et al(2013a)等研究发现,来自低工资国家(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美国的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当时处于萧条阶段,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根本无法吸收进口贸易冲击带来的制造业失业人员,唯一能吸收劳动力的是高科技行业,而从制造业中退出的人员往往是低端蓝领工人,不具备高科技行业所需要的技术能力,进而造成失业人员增多。

2. 劳动力流动成本高低。关于在贸易冲击下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测度劳动力跨行业的流动成本。部分学者针对单个国家进行了研

究。例如,Artuc et al(2010)以美国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劳动力跨行业流动的成本。他们在动态劳动力调整的理性预期模型中使用 Euler-type 均衡条件,利用美国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数据测度出了美国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成本的中位数和方差。研究发现,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成本的中位数和方差的数值均较大,这说明进口国劳动力市场面对进口贸易冲击的调整很缓慢。Dix-Carneiro(2014)则采用结构动态均衡模型估计了巴西劳动力市场,进而研究了贸易带来的转型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跨行业移动成本的中位数为平均年度工资的 1.4~2.7 倍,但不同劳动力的移动成本存在较大分布差异。另外,他们使用反事实方法估计发现:(1)很多劳动力市场面对贸易自由化都会有所反应,通常反应具有几年的滞后期;(2)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滞后性导致贸易带来的潜在加总福利显著减少;(3)进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取决于首期行业的就业规模、劳动者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等个性特征。

部分学者采用国际样本进行了研究,例如 Artuc et al(2015)测算了 1986—2007 年 25 个发达国家和 31 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成本。测算结果表明:(1)从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成本相当于劳动者年度工资的 3.71 倍,而发达国家为 2.76 倍。(2)从各大洲来看,沙特阿拉伯的劳动力流动成本相当于劳动者年度工资的 4.0 倍,东欧和中亚为 3.95 倍,南亚为 3.88 倍,中东和北非为 3.59 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 3.46 倍,拉丁美洲为 3.23 倍。(3)从具体国家来看,菲律宾的劳动力流动成本最高,为年度工资的 5.06 倍,而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成本最低,为年度工资的 2.75 倍。除此之外,他们通过可观测的行业劳动力配置情况与内含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成本的理论模型预测的劳动力配置情况之差来估算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成本,发现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存在显著差异,但都与该国发展水平(人均 GDP、教育参与率)呈反比,与该国经济中的摩擦、扭曲和限制呈正比关系。最后,他们还使用这些估算结果来探讨劳动力市场对贸易政策的反应情况。通过估算发现,当地劳动力市场对贸易开放的调整时间平均为 6 年,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国家市场调整成本越高,市场调整时间更长,贸易调整的成本代价越大。

3.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主要是指该国的劳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直接影响企业的雇佣和解雇成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程度不高会显著限制进口贸易冲击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Donoso et al, 2015; Cosar et al, 2016),降低资源再配置效率和总体生产率水平的提升(Kambourov, 2009; Kang, 2015),带来短期失业问题(Helpman & Itskhoki, 2010; Cacciatore, 2014)。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日益成为一国的比较优势(Davidson et al, 1999; Cunat & Melitz, 2012; Helpman & Itskhoki, 2010; Gan et al, 2016)。传统的贸易理论指出,贸易开放后一国总体福利会增加,因为劳动力等要素可以流向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提高该国的整体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依赖于该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Kambourov(2009)研究外贸改革对一国劳动力市场再配置的影响时发现,如果一国开放贸易,但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比如解雇员工的成本很高,那么贸易开放带来的福利增加会大打折扣。较高的员工解雇成本不仅影响企业解雇员工的决策,也影响企业雇佣新员工的决策;如果贸易开放的同时没有开放劳动力市场,那么劳动力跨行业的流动会降低30%,相应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损失。企业解雇成本通常归为以下几类:(1)提前通知成本;(2)被解雇员工的补偿金;(3)被解雇员工的额外工龄费;(4)被解雇雇员的工资损失;(5)被集体解雇员工的额外成本。在拉丁美洲,对于工作1年的员工,平均解雇成本相当于其两个月的工资;而对于工作10年的员工,平均解雇成本相当于其11个月的工资。从政策角度来说,贸易开放需要与劳动力市场开放相互协调一致。

随着行业内贸易不断开放,同行业的进口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产生市场选择效应,从而带来行业总生产率提升。市场选择效应将资源配置给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这个过程也会因为当地劳动力市场刚性而受阻。Kang(2015)考察1971—2003年19个OECD国家的案例后发现,一国的劳动力市场刚性会抑制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尤其对于劳动力市场严重僵化、外资R&D资本存量较小的国家,贸易开放可能会拉低该国的生产率水平。Cacciatore(2014)从理论角度指出对外贸易在短期内会带来失业;劳动力市场僵化短期内虽可减少失业损失,却降低了

一国的贸易收益。Donoso et al(2015)研究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造成了西班牙制造业人数的减少,且影响幅度大于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幅度,原因在于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Cosar et al(2016)研究发现,员工解雇成本的下降强化了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工作流动和非正规就业率增长的促进作用。

此外,劳动力的特殊专业技能也会给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构成一定的障碍。Brülhart et al(2006)采用1995—2000年英国制造业部门的数据研究发现,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率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率要高,因为劳动力流动成本与其行业专用技能呈正向关系;专业技能水平越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越高。Cosar(2013)针对巴西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下劳动力市场的动态调整具有三个特征,分别是出口导向部门在劳动力净吸收方面速度缓慢,离职工人再就业的成本很高,年长的劳动力就业再调整负担非常大;相比就业搜寻摩擦,劳动力的特殊专业技能对再就业影响更大。

三、进口冲击后的劳动力市场再均衡

受进口冲击后,劳动力市场会再次达到均衡状况。新均衡下的就业规模和工资、单个劳动者就业状态与工资均与劳动力流出行业的劳动密集度和流入行业的劳动密集度密切相关。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在工资刚性条件下(工资刚性或最低工资标准),就可能出现失业问题;在工资弹性条件下,就业规模不变,工资可能下降。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工资则会上升。以上分析在劳动力同质假定下成立。但是,当劳动力异质时,这一结论就会发生改变。比如,当生产需要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两种劳动要素时,进口竞争下退出市场的企业会释放这两种劳动要素。如果要素流出行业是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而要素流入行业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则低技能劳动力将面临工资减少或失业的风险,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将可能提升,就业机会增加。

(一)进口竞争行业就业减少、工资变动不确定

众多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一致: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会导致进口国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总量减少,但对工资影响不确定。

1. 进口贸易政策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1)对于就业的影响。Pierce & Schott(2016a)研究了自

2000年以来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使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了不同行业就业增长率在PNTR前(1990—1996年)与PNTR后(2001—2007年)的相对变化,发现相比PNTR前后变化较小的行业而言,变化较大的行业就业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体现在这些行业从中国的进口额增幅较大,从中国进口的美国企业数增加更多,向美国出口的中国企业数增加更多;同时比较了2001年以后和1990年以后的平均工业就业增长率,发现1年后相对就业增长率下降了3.4%,而6年后相对就业增长率下降了15.6%。对于同期作为参照组的欧洲,由于没有任何政策冲击,就没有发现这一结论。Ebenstein et al(2011)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就业增长与美国就业存在负向关系,并且中国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正是美国就业减少最快的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两者的替代关系。Federico(2010)针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与意大利制造业在1995—2007年的就业呈现负向关系。Donoso et al(2015)发现西班牙制造业在制成品进口冲击下就业量有所下降。(2)对工资的影响。Cosar et al(2016)采用哥伦比亚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进口关税下降使得该国平均工资和工作转换率均有所提升。Hakobyan & McLaren(2010)研究了在NAFTA导致的关税下降情况下美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发现受到墨西哥进口增加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的工资均出现了下降。Francisco et al(2016)发现2000—2010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造成了巴西相关行业的工资水平增长缓慢。

2. 进口贸易流量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对于进口贸易流量的代理变量,早期主要采用总进口渗透率(一国进口总额占该国消费总额的比重,其中消费总额是国内总产值减去净出口),近期众多学者开始采用根据单个或少数进口来源国的进口额计算的进口渗透率,将一国受到的进口冲击归于某个或少数国家。

(1)对全国范围的影响。Revenge(1992)研究了日益增加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采用1977—1987年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进口价格的变动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水平都有显著影响。Bernard et al(2006)利用1977—1997

年美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使得美国制造业企业增长缓慢,更容易退出市场。Auer & Fischer(2010)研究发现,1990—2007年间来自中国的制成品进口竞争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减少。Acharya(2015)利用1992—2007年加拿大88个行业数据研究发现,进口增长会抑制就业增长,但抑制幅度很小,相当于减少了加拿大就业增长率的2%,或减少了2007年加拿大0.036%的就业岗位;来自中国的进口主要对加拿大的信息通信行业和一些低研发密集型行业冲击较大;同时,总进口增长对工资水平没有影响,但双边进口增长对工资水平有差异性影响,来自中国的进口降低了加拿大的工资水平,而来自墨西哥的进口提升了加拿大的工资水平。

(2)对地区的差异性影响。因行业结构不同,各地劳动力市场所受到的进口冲击也不同。Autor et al(2013a)研究发现,从中国进口较多的美国地区不仅失去了很多制造业工作机会,并且总体就业量也在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较多工人领取失业救济金、食物券和残疾补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可以解释美国制造业近期总就业量下降的1/4,但没有发现对工资有明显的影响。Autor et al(2013a)研究指出,这可能是没有控制美国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所致。随后,Autor et al(2013b)基于县级层面数据处理了这一识别问题。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具有地理集中性,而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负面影响具有全国性,控制美国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将技术进步效应剥离开来,可以精确估计进口冲击效应;该文仍旧得出来自中国的进口减少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结论。Donoso et al(2015)发现西班牙1999—2007年从中国进口的金额增长了6倍,对中国进口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其制造业就业人口比例较低。Pierce & Schott(2016b)以美国各郡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进口开放越大的地区,人口死亡率越高,这一现象与该地区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密切相关。

(3)对企业的差异性影响。McManus & Schaur(2016)采用1996—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数据与美国制造业的工伤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受到中国进口冲击严重的美国制造业的工伤率从短期到长期在提升,尤其是受到进口冲击严重的小型企业;反推法显示,小企业的工伤率上升13%,等价于工人工资下降

1%~2%。

(二)对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异质性影响

1. 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就业效应存在劳动力差异性。从技能异质角度看,一般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会减少其低技能、低学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增加高技能、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增加会导致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对高技能工人就业的影响不确定;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会导致高技能工人就业和工资的增加。Autor et al(2014)研究指出,面临中国产品的进口竞争,美国不同工人受到的冲击是不同的,高收入的工人受进口冲击较小,因为他们可以换工作,甚至换行业;而低收入的工人只能留在制造业,并遭受贸易冲击带来的损失。Balsvik et al(2015)则借鉴 Autor et al(2013b)的方法,以挪威为案例进行研究,不断增长的中国进口竞争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概率,但对留在工作岗位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没有影响。Mion et al(2013)以比利时为例,分析了1996—2007年期间来自不同来源国的进口对比利时制造业企业就业和技能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来自低收入国家和OECD国家的进口都不同,来自中国的进口虽然降低了企业的就业增长,但导致低技术制造业的技能需求增加,对于低技术制造业而言,来自中国的进口有利于技能工人占比的提升。Kemeny et al(2013)从劳动力教育水平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对美国制造业1992—2007年间就业减少的影响,发现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提升了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制造业劳动力失业的概率,对具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的就业影响不显著。与此略有不同的是,Helpman et al(2010)研究贸易对不同能力水平工人的影响时发现,在进行贸易后,与低能力工人和高能力工人相比,中等能力工人的平均工资将下降,失业率将增加。Khandelwal et al(2010)研究指出,进口竞争会导致质量阶梯较长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进而对非常规技能工人的需求量增加。Amiti & Cameron(2012)研究发现,随着进口投入品关税的下降,在印尼制造业企业中,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相对于生产性工人的工资是下降的。Gonzaga et al(2006)和Dix-Carneiro & Kovak(2015)研究发现,巴西进口贸易自由化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

2. 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影响。通过引入外国竞争,贸易开放降低了性别歧视,增加了女性就业。Ederington et al(2009)使用哥伦比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关税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中,女性蓝领工人相对于男性蓝领工人的人数在增多。Aguayo et al(2013)使用墨西哥 households 调查数据和企业层面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伴随NAFTA建立带来的进口关税下降,行业内和行业间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从进口保护角度来看,Avsar(2014)采用21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保护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保护提升了资本丰裕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但降低了劳动丰裕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之相反,Sauré et al(2014)却发现进口自由化降低了资本丰裕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他们将行业分为女性密集型行业和男性密集型行业,当女性密集型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时,贸易开放会导致女性密集型行业扩张、男性密集型行业萎缩,男性劳动力从男性密集型行业流向女性密集型行业,稀释女性密集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基于资本和女性劳动力较高的互补关系,女性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下降幅度大于男性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因此,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会拉大,女性劳动参与率会降低。也就是说,资本丰裕国家与资本稀缺国家的贸易一体化会使得资本丰裕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正规就业概率下降、周工作小时减少),以及女性相对男性的工资下降。

四、进口贸易对劳动力其他方面的影响

除了对就业和工资产生影响之外,进口贸易还能对劳动力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如教育投资决策。如果流出资源的进口竞争行业是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而流入资源的其他行业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则进口竞争行业释放的低技能劳动力可能会失业,高技能劳动力可能面临技能折价风险、工资减少,但高技能劳动力失业风险远低于低技能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工资刚性下的失业风险还是工资弹性下的工资减少风险,低技能劳动力均面临严峻的挑战。对低技能劳动力来说,增加教育投资(即增加受教育年限)是规避失业的重要途径。

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显示,进口关税改革影响了劳动者教育投资决策。比如,Edmond et al(2010)通过检验印度1991年贸易改革带来的影响发现,生活在关

税降幅较大地区的儿童就学率有小幅提升,收入提高是增加儿童接受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面对未来工作对技能需求的预期,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会发生改变。Oster & Steinberg(2013)研究发现,技能型工作机会的增加提升了印度小学入学率。

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显示,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下降(Bernard et al, 2006; Auer & Fischer, 2010; Ebenstein et al, 2011; Autor et al, 2013a; Pierce & Schott, 2016a),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相对提高并且工作更稳定,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会拉大(Feenstra & Hanson, 1996),进而增加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具体而言, Acharya(2015)研究 1992—2007 年加拿大劳动力教育结构的变化发现,初中及以下劳动力占总体劳动力的比例从 1992 年的 51% 下降到 2007 年的 36%,高中学历的劳动力比例上升 8 个百分点(从 36% 上升到 44%),大学学历的劳动力比例上升 7 个百分点(从 13% 上升到 20%),但是加拿大的进口贸易对劳动力教育结构改变的影响程度仍不确定。Greenland & Lopresti(2016)研究了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控制影响高中完成率的其他因素(如与贸易无关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之后研究发现,从中国进口较多的地区,高中毕业率提升也较多。因为进口较多的地区,所有劳动者工资都有所下降;并且低于高中学历的劳动者相对于高中学历以上的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更多。面对如此劳动力市场,更多人选择追加教育投资来提升未来的就业竞争力,进而提升了该地区的高中毕业率。

已有研究也表明,如果生产中使用进口中间投入产品,企业将接受更加复杂的技术,带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从而增加对技能工人的需求。众多文献对技能工人的界定采用劳动力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受教育年数的增加代表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Kasahara et al(2016)采用印度尼西亚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开始进口中间品对其生产工人和管理人员(非生产工人)受教育年数的影响,通过预估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确实提升了各类技能工人的受教育年数,而对管理人员(非生产工人)的受教育年数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展现了进口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过程:(1)进口贸易带来的竞争效应会对国内企业造成冲击,一部分企业由于生产率较低、竞争力不强,生产规模将缩小甚至会退出市场,高生产率的企业得以存活并发展壮大,从而导致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2)从破产企业和规模萎缩企业流出的劳动力将面临跨行业或跨地区流动。一方面,劳动力会从受竞争冲击较大的行业转向受进口冲击较小的行业,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另一方面,劳动力从受进口冲击较大的地区转移到受进口冲击较小的地区。但是,由于进口国产业结构特征、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存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较低,不是所有流出的劳动力都能成功再就业。(3)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会导致进口国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总量减少,对于其工资水平的影响不确定。但是,对不同技能、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影响具有差异性。(4)进口冲击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调整会进一步影响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决策。

进一步来看,进口贸易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调整对进口国经济福利的影响至少包括两个方面:(1)资源再配置效应。国内劳动力跨行业或跨地区流动本质是资源再配置过程,会影响进口国总体生产率水平。如果进口贸易带来的劳动力重置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则将提升该国总体生产率水平,促进其经济增长,反之会抑制其经济增长。(2)收入不平等效应。在进口竞争方面,如果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低技能劳动者,那么可能会促使其增加教育投资;如果受到冲击的主要是高技能劳动者,则可能会抑制其教育投资。现实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正在减少教育投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正在增加教育投资,进而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进口投入方面,由于进口投入品具有技能偏向型特征,它会促进进口企业雇佣更多的技能工人,推动技能工人工资上涨,进而拉大企业内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出现技能溢价现象。可见,技能偏向型进口贸易可能会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

总的来说,进口贸易对进口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结合中国的现实,

测度进口贸易导致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测度劳动力流动成本、利用企业层面的雇员个体数据测度进口贸易对企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Acharya, C. (2015), "Impact of trade on Canada's employment, skill and wage structure", <http://dx.doi.org/10.1111/twec.12360>.
- Amiti, M. & L. Cameron(2012),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wage skill premium: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7(2):277-287.
- Aguayo, E. et al(2013), "Did trade liberalization help women? The case of Mexico in the 1990s", *Labor Economy* 38(4):548-553.
- Artuc, E., S. Chaudhuri & J. McLaren(2010), "Trade shocks and labor adjustment: A structural empirical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3):1008-1045.
- Artuc, E., D. Lederman & G. Porto(2015), "A mapping of labor mobility cos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5(1):28-41.
- Auer, R. & A. M. Fischer(2010), "The effect of low-wage import competition on U. S. inflationary pressure", *Journal Monetary Economics* 57(4):491-503.
- Autor, D. H., D. Dorn & G. H. Hanson(2013a),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2121-2168.
- Autor, D. H., D. Dorn & G. H. Hanson(2013b), "The geography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sho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220-225.
- Autor, D. H. et al(2014), "Trade adjustment: Worker leve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1799-1860.
- Autor, D. H., D. Dorn & G. H. Hanson(2015), "Untangl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local labor markets", *Economic Journal* 125(584):621-646.
- Avsar, V. (2014), "Import protection and female labor",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59(5):1-8.
- Balsvik, R., S. Jensen & K. G. Salvanes(2015), "Made in China, sold in Norway: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an import shock",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7(10):137-144.
- Bernard, A. B., J. B. Jensen & P. K. Schott(2006), "Survival of the best fit: Exposure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the (uneven) growth of US manufacturing pl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219-237.
- Brühlhart, M. et al(2006),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labour-market adjustment: A reassessment using data on individual worker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2(3):521-545.
- Cacciatore, M. (2014),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dynamics with labor market fric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3(1):17-30.
- Cosar, K., N. Guner & J. Tybout(2016), "Firm dynamics, job turnover, and wage distributions in an open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3):625-663.
- Cosar, A. K. (2013), "Adjusting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Reallocation and labor market policies",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Crino, R. (2012), "Imported inputs and skill upgrading", *Labor Economics* 19(6):967-969.
- Cunat, A. & M. J. Melitz(2012), "Volatility,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the patter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0(2):225-254.
- Davidson, C. et al(2014), "Globalization and imperfect labor market sort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2):177-194.
- Davidson, C., L. Martin & S. Matusz(1999), "Trade and search generate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8(2):271-299.
- Dix-Carneiro, R. (2014),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Econometrica* 82(3):825-885.
- Dix-Carneiro, R. & B. K. Kovak(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skill premium: A local labor markets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551-557.
- Donoso, V., V. Martín & A. Minondo(2015), "Do differences in the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s lead to differences in local labour market outcomes? An analysis for Spanish provinces", *Regional Studies* 49(10):1746-1764.
- Ebenstein, A. et al (2011),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https://scholars.huji.ac.il>.
- Ederington, J. et al(2009), "Where the girls are: Trade and labor market segregation in Colombia",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131, Bonn.
- Edmond, E. V., N. Pavcnik & P. Topalava(2010), "Trade adju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Indian tariff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4):42-75.
- Feenstra, R. C. & G. H. Hanson(1999),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979-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907-940.

- Federico, S. (2010), "Industry dynamics and competition from low-wage countries: Evidence on Ital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76(3):389-410.
- Francisco, C., J. Garred & J. P. Pessoa(2016),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a commodities for manufactures trade boo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2(1):50-69.
- Fugazza, M. & N. M. Fiess(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formality: New stylized facts", UN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Study Series No. 43.
- Gan, L., M. A. Hernandez & S. Ma(2016), "The higher cost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Minimum wages and firms' export behavi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0(1):81-94.
- Goldberg, P. K. & N. Pavcnik (2007),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1):39-82.
- Gonzagaa, G. et al(2006),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kill earnings differentials in Braz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2):345-367.
- Greenland, A. & J. Lopresti(2016), "Import exposure and human capital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U. 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0(1):50-60.
- Groizard, J. L., P. Ranjan & A. Rodriguez-Lopez (2015), "Trade costs and job flows: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 level data", *Economic Inquiry* 53(1):173-204.
- Hakobyan, S. & J. McLaren(2010), "Looking for local labor-market effects of NAFTA",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98(4):728-741.
- Helpman E. & O. Itskhoki (2010),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trade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7(3):1100-1137.
- Helpman, E., O. Itskhoki & S. Redding (2010), "Unequal effects of trade on worker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8(2-3):421-433.
- Itskhoki, O. & E. Helpman (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http://www.princeton.edu>.
- Jiang, X. (2015), "Employment effects of trade in intermediate and final good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54(2):147-164.
- Kambourov, G. (2009),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s and the sectoral reallocation of workers: The case of trade refo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4):1321-1358.
- Kang, Y. (2015), "Trade, labor market rigidity,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in OECD countries", *Applied Economics* 47(6):531-543.
- Kasahara, H., Y. Liang & J. Rodrigue(2016), "Does importing intermediates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skilled workers? Plant-leve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2(1):242-261.
- Kemeny, T., D. Rigby & A. Cooke(2013), "Cheap imports and the loss of US manufacturing jobs", *World Economy* 38(3):703-712.
- Khandelwal, A. (2010), "The long and short (of) quality lad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7(4):1450-1476.
- McCaig, B. & N. Pavcnik(2015), "Informal employment in a growing and globalizing low income country",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0891.
- McManus, T. C. & G. Schaur(2016), "The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worker h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2(1):160-172.
- Mendez, O. (2015), "The effect of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on Mexican local labor market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34(11):364-380.
- Mion, G. & L. Zhu(2013),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and offshoring to China: A curse or blessing for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9(1):202-215.
- Oster, E. & B. M. Steinberg(2013), "Do IT service centers promote school enrollment? Evidence from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4(1):123-135.
- Paz, L. S. (2014), "The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informal labor market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Brazilian ca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2):330-348.
- Pierce, J. R. & P. K. Schott(2016a),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 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7):1632-1662.
- Pierce, J. R. & P. K. Schott (2016b),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U. S. countie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2849.
- Reventa, A. L. (1992), "Exporting jobs? The impact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employment and wages in U. S. manufactur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1):255-284.
- Sauré, P. & H. Zoabi(2014),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gender wage gap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1(2):17-33.

(责任编辑:李仁贵)

(校对:刘洪愧)

— 141 —